

瞿秋白早期创作与俄罗斯文学

[作者] 陈春生

[单位] 湖北师范学院中国语言文学系

[摘要] 本文以瞿秋白早期创文学活动与俄罗斯文学关系为研究对象,认为瞿秋白在接受俄罗斯文学的影响时,显示了人格的矛盾,一方面他注重外在的行动,另一方面却迷恋托尔斯泰主义,在具体创作中,借用托尔斯泰等作家的表现方法进行文体实验,在五四文学发展史上留下了重要的一笔。

[关键词] 瞿秋白, 早期创作, 俄罗斯文学

瞿秋白是在一种非常偶然的的情况下与俄罗斯文学发生联系的,1917年4月,为求生活,他远赴北京参加普通文官考试,结果失利,9月份,出于谋生考虑,瞿秋白只好退而求其次,投考北洋政府外交部所设立的俄文专修馆,学习俄语。俄文专修馆是当时北洋政府为培养外交人才而创办的,瞿秋白选择这所学校的目的简单而朴素:为将来步入社会,能找份工作,以解决生计问题。但正是这次不经意的选择,使瞿秋白走上了一条叛逆现实、寻求光明的道路。而引导着他奋然前行的是刚刚发生革命的俄国和俄罗斯文学。

瞿秋白一生,一直扮演着多重社会角色,这些角色既展示了他多方面的才华,但也与他接受的传统教育、人生追求甚至个人性格气质、爱好兴趣常常发生矛盾。因此,在他不太长的一生中,他的精神人格常常处在一种无法调适的焦虑和痛苦状态,而这种最为隐秘的精神痛苦又与他羸弱的身体,他严重的肺病等生理上的病痛纠结在一起,构成了他多重复杂的人格。

瞿秋白多重复杂性格包含着两个明显矛盾的指向,一个是注重外在行动,这一行为特征以儒家入世思想为基调,它成为瞿秋白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契机,也正是在这一点上,瞿秋白显示了与传统士大夫的分野,具有西方现代知识分子的特征,这一精神特点使他敏锐地观察到事件的实质,具有一种天然的领导者的素质。但是,与之相应的是“静”的性格,它与传统文化中老庄的“隐逸”、“遁世”相联系,这种精神人格的特点是敏感、细腻、关注内心的感受。在释家、道家玄奥的终极世界里,进行着人生意义的形而上的探询,瞿秋白不再把自己看成是一个生活在具体社会关系中的人,而是一个觉醒了的“人”的形象,并对自我心灵世界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动”是瞿秋白性格中的主要因素,但传统文人的气质隐性存在于他的性格中,并不时地突现出来,有时甚至干扰遮蔽了他的主导性格,特别是当社会化角色受到外在环境打压时,那种被遮蔽了渴望“超脱”的精神性格就表现得强烈些。

我们知道,瞿秋白是以一篇政论文开始对现实社会发言的。通过对社会现状的分析,瞿秋白展示了积极的行动意识。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失败,激起国人的爱国浪潮,瞿秋白以世界性眼光,迅速对这一历史性事件作出反映,他把中国人失败的原因,归于“没有坚毅的志向和明敏的智慧,不能组织一良好的社会去迎合世界潮流,建设一巩固的国家,去迎合世界的现势。”很显然,瞿秋白抓住了问题的要害,因为巴黎和会之所以敢于轻视中国,就因为中国四分五裂,国运衰颓,因此要想避免相同事件的再次发生,就应该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而且这个国家要符合世界发展的潮流。他向人民呼吁:“要想改变积弱的现实,古老的中国”那就不能不赶快觉悟——真正的觉悟——去改造现在的社会,重建现在的国家”,在如何重建

国家这一问题上，瞿秋白显然比一般青年更具有理性思考力，在同一时期发表的论文中，他认为中国革新的机会到了，“坐着说不如站起来做，”“中国人若是多能够趁着这个时机，极力奋斗一下，非但中国自身有无穷的希望，就是对于世界也要有极大的贡献”，瞿秋白认为五四运动以后，作为革新家，“应当注意的事情极多，而最要紧的就是：力求普及这种新思想，”瞿秋白甚至认为包括辛亥革命在内的革新运动，因为带有“君子小人”主义色彩。不是真正的革新运动，而我们要建立的当是真正的“民主、民治、民本的国家或世界”，为此，他提出了具体实施的计划：“一、竭力传播德谟克拉西；二、竭力打破‘君子小人’主义；三、竭力谋全人类生活的改善；四、到穷乡僻县——远至于西藏、蒙古、新疆——去，实施平民教育；五、实行‘工学主义’，‘学工主义’；六、研究科学、传播科学。”这些睿智的、热情洋溢的文字，贯穿着一种“行动”意识。

但检视瞿秋白同期的翻译作品，我们可以看出，他选择的作品与他参与社会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行动意识并不一致。如果从他当时所遵从的启蒙观点看，俄罗斯历史上的革命民主主义作家们的著作似乎更能在中国的现实社会中发挥作用，但是他却没有在这些人的作品中获取精神资源，而是关注托尔斯泰、果戈理等人的创作。1919年9月，他翻译了第1篇俄文小说——托尔斯泰的《闲谈》，1920年又翻译发表了托尔斯泰的《祈祷》，果戈理的《仆御室》，《妇女》，阿里鲍甫《可怕的字》、兹腊托夫拉斯基《痴子》、契可夫的《好人》以及《国际歌》。此外他和耿济之共同翻译了《三死》等4篇托尔斯泰的小说，这些译作连同耿济之翻译的6篇托尔斯泰的小说，于1921年，以《托尔斯泰短篇小说集》出版，署名“瞿秋白耿济之同译”，他还准备翻译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复活》，因为出国未能实现。这些作品的翻译选择，以今天的眼光看，似乎带有很大的随意性，无论是托尔斯泰还是果戈理的作品，在两位作家的全部创作中，基本上没有什么位置。但如果我们把这些作品看成承载翻译者思想观念、审美指向的一个体系，就能获得许多有价值的文化信息。

在这些翻译接受的作品中托尔斯泰占有相当的比重，瞿秋白曾谈到托尔斯泰对他的影响，在生命行将结束时，他回忆说：1919至1920年“我是一个近于托尔斯泰的无政府主义者”。又说：“我廿一二岁正当所谓人生观形成时期，理智方面正是从托尔斯泰的无政府主义，很快转到了马克思主义。”这表明作为一个中间环节，托尔斯泰是瞿秋白思想观念发生裂变的一个不可少的阶段。

二

瞿秋白为什么会托尔斯泰产生亲和力呢？这与托尔斯泰的晚年的思想倾向有关。19世纪70年代，托尔斯泰的思想和生活发生了一场激变，经过长期的精神探索和痛苦的思考之后，托尔斯泰终于从封建贵族地主阶级中走了出来，并试图融入到宗法制农民阶级之中，一方面他对俄国社会种种罪恶和不合理的社会制度进行了不妥协的揭露和批判，另一方面，他把解决社会矛盾寄希望于人的道德自我完善，并且很虔诚地提出了“不以暴力抗恶”的观点，在俄国社会发生剧烈动荡、革命已经成为不可避免的历史潮流的时候，这种不合适宜的观点，与俄罗斯现实的历史发展要求背道而驰。在重建自己的信仰和价值观的过程中，托尔斯泰把目光投向了中国的老子、庄子和孔子以及佛教，试图从古老的东方哲学中寻找真理。据统计，从1884到1910年，20多年的时间里，托尔斯泰写过和编过10余种有关中国哲学思想的著作和论文。1877年，托尔斯泰非常欣赏老子的“道”和“无为”思想，后来开始阅读和研究老子，并写了《论老子学说的精髓》，1891年10月，出版家列杰尔列询问他，世界那些作家和思想家对他影响最深，他回答说，孔子和孟子“很大”而老子则“巨大”，他在给中国人张庆桐的信中，颇为自豪地说：“因为很久以来，我就相当熟悉中国的宗教学说和哲学。”在给辜鸿铭的回信中，可以看出他晚年的思想与老庄学说之间的联系，他说：

“中国人现在只有继续像他们过去一样，过着和平的，热爱劳动的和从事农业的生活，在行为上遵循着他们的三种宗教：儒教、道教、佛教的道义，这三种宗教的道义是相符合的，就是要从一切人的权力统治之下解放出来（儒教），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道教），实行自我牺牲，温顺，对一切人和一切的生物都要慈爱（佛教），如果这样做，那么他们现在所遭受的一切痛苦将会自行消失，也没有任何力量能使他们屈服。”这实际上是托尔斯泰主义的中国哲学式的阐释。托尔斯泰特别欣赏老子所说‘上善若水’，庄子的“无为而治”，佛家的“忍”。认为这些都是对人生的感悟，他提倡不以恶抗恶，因为在他看来，以恶抗恶并不能减少恶，而只能增加恶，而且托尔斯泰晚年从愤怒走向宽容，是中国的哲学智慧在起作用，既然人的肉体，人在尘世的一生的经历，只不过是“相”，而非生命的实质，那么何必又执着于它，强迫别人接受自己的观点呢？而且托尔斯泰的解脱方式也颇具有中国特点：“空间、时间、原因都是思维的形式，生命的实质超乎这些形式之外，不仅如此，我们的这个生命越来越屈从于这些形式，然后再从这些形式中解脱。——”，甚至在出走前夜，他的愿望也是“抛弃俗世生活，以便独处，在一处僻静的地方度过一生最后的时日。”我们可以看出托尔斯泰晚年“不以暴力抗恶”和“道德自我完善”思想和中国传统哲学的深刻联系。而在风云际会的五四时代，瞿秋白翻译接受与外在行为的错位性，表明瞿秋白在个性审美与社会需要之间更注重自我的需要。但应该注意的是，瞿秋白对托尔斯泰感兴趣并没有多久，很快地他的思想就转到马克思主义，这也是五四时期，一大批激进的知识青年所走过的心路历程。

因此，可以这样说，在瞿秋白刚开始接受俄罗斯文学时，是传统文化积淀形成的审美观念的惰性作用规范制约着他对俄罗斯文学的阅读和接受，他着迷于托尔斯泰，实际上，并不是托尔斯泰学说中的西方异质文化吸引了他，而是托尔斯泰学说中与中国传统的老庄文化相契合部分。关于这种接受机制，一些文艺批评家试图从理论上加以探讨，皮亚杰从发生认识论的角度解释了这一现象，他认为人的心理认识结构有顺化和同化、调节与平衡的功能，人依照自我的心理格局来认知、接受外界的刺激，心理认知过程最简便的途径是心理认同，从他事物中发现自我心理文化乐意接受的某些因素，或按照自我心理格局来认识对方。在这种认知与同化中接受者的文化传统在发挥着潜在的作用。斯宾格勒也认为：在影响接受中，某人意欲表现的东西就是他自己先天所具有的东西，从他所面临的一大套过去的形式中，他真正看到了少数他想要看到的形式，并且当他们需要的时候才去看它们……换句话说，与他自己的意图一致而不是与原创人的意图一致。瞿秋白所接受的东西，恰恰是他在接受之前就具有的东西。

三

瞿秋白早期文学创作应该分为两个阶段，赴俄之前（1919年9月—1920年9月），是创作的准备期；主要代表作品是《心的声音》，在俄国和归国之后（1920年10月—1924年10月）是创作的丰收期，代表作品有《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本文主要研究他创作准备期的作品，从中可以看出古典俄罗斯文学资源对他创作的影响。

首先，我们选择他的议论文《中国知识阶级的家庭》作为个案进行分析，这篇文章共分4部分，其中第1部分，基本上是对一个场景的描述，如果我们把这篇文章与在这之前瞿秋白翻译的托尔斯泰的《闲谈》联系在一起进行比照阅读的话，就可以看出，无论是文章的思想内容还是表现手法，都与托尔斯泰的《闲谈》具有很明显的内在联系，托尔斯泰思想发生变化以后，对于西方的现代文明，以及这种文明的代表阶层表现出一种强烈的排斥情绪，因此，到了他晚期创作中，能够代表他理想生活的人不是“忏悔贵族”而是那些愚昧的没有接受知识熏陶的农奴，因为这些人，面对现实世界的痛苦，能坦然领受，他们有着淳朴的心，他们想着上帝，托尔斯泰的思想立场转到宗法制农民本身就表明同统治阶级的决裂，也在与

自己的知识分子的身份决裂，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知识就是罪恶，是一些人借以压迫另一些人的工具，在《闲谈》中，托尔斯泰提出“帮助人家，最要紧是要能同所有人都象兄弟一样。所以名利二字是要丢开的。”这种泛爱主义思想，是在削平了知识贵族阶级以后提出来的，他的思想核心是基于基督教的宽容精神。瞿秋白写《中国的知识阶级家庭》时，正处在短暂对托尔斯泰的无政府主义发生兴趣的阶段，在内容上，可以看出与托尔斯泰精神的内在一致性，瞿秋白也认为“万恶之源”在于“知识阶级”，即“劳心者治人的一般人”。在中国，知识阶级的一部分，从纯粹的知识分子中分离出来，成为社会的统治者，执掌着对一般民众生杀予夺的大权，为了维护统治，他们鼓吹“学而优则仕”，加强意识形态的控制，另一方面，又通过控制思想，推行愚民政策，因此，在一个激进的时代，瞿秋白把中国社会的罪恶，归结于陈腐的中国知识界应该是合理的，因为这些人没有信仰，只有一己之私利。只有中国知识分子得救了，中国才有希望。

瞿秋白除了表达了与托尔斯泰相近似的思想观念外，写作手法也明显的借鉴了《闲谈》，首先，瞿秋白和托尔斯泰一样，以客厅为人物活动的基本场景，以人物的闲谈来建构整个故事框架，横截一个生活场面来表现不同人物的性格和气质，思想主题也是在相互不经意的谈话中流露出来的，两部作品基本上都是一幅人物速写画。读者只能通过人物的对话来判断人物的性格和思想。其次，在对话中，瞿秋白也像托尔斯泰一样，安排了一个代言人，来传达自己的思想，托尔斯泰思想的代言人是一个年轻的小伙子：“我要把我的财产多丢开，到乡村里面同贫苦的人一同住。同他们一起做工，学做手艺。倘若那许多贫苦的人，要用得着我的教化，我就教他们，也用不着什么书本教室。我们简直同他像兄弟们一样的同在一起生活。”而瞿秋白则是通过一个“到学校乱闯”的北大青年，“手里拿着一卷油印纸”来表示真正有意义的生活是参与到实际工作中去。如果联系到五四运动的目的就是启蒙民众的话，我们应该说，这两个生活在不同背景下的青年人，其使命是一致的。其三，瞿秋白也借用了托尔斯泰惯常使用的对比手法，把上流社会生活的无聊和无意义，揭示了出来，像托尔斯泰一样，瞿秋白把新生活的希望寄托在自己的代言人身上。而与之相对应的是，瞿秋白否定了中国知识阶级盲目乐观、自大的心态和围裹在当权者身边的人的愚昧、麻木，并对中国以人身依附关系建构的官僚体制进行了批判。通过这种比较可以看出，瞿秋白在接受托尔斯泰思想影响的同时，还在艺术表现手法上吸纳了托尔斯泰的表现方法，因此可以说，这是一篇无论从思想还是表现手法上与托尔斯泰最为接近一个个案，它的存在，证明瞿秋白所言自己在一段时间内信奉托尔斯泰是事实，而且恰恰在五四的高潮期，这种现象的存在本身也说明了瞿秋白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思想观念的复杂性。这段描写由于瞿秋白把它放在政论文前面，作为谈论中国知识阶级的引子，因而过去一直未被人注意到。

1920年3月，瞿秋白发表了一组题为《心的声音》散文。实际上，其中有些篇目完全是小说，在主体部分，《爱》和《劳动》两篇，可以看出托尔斯泰的泛爱主义对瞿秋白的影响，就像托尔斯泰在宗法制农民身上找到了精神寄托一样，在《爱》中，瞿秋白从生活在底层的劳苦民众身上，看到了一幅充满爱的画卷，这种爱超越物质对人精神的制约，贫穷甚至被作者涂抹上了温馨和谐的色彩，作者为我们展示了两幅画面，一个老头儿对孙子的关照，和一个车夫与孩子的和谐的关系，作者没有探讨贫穷的根源，而是关注超越苦难之上的爱，“爱——宇宙建筑在你上”。

在《劳动？》中作者展示了乡村生活的美好，表现出对都市文明的嫌恶，这恰恰与托尔斯泰那种对乡村生活的迷恋和贬损现代都市文明的观念相一致，作者对乡村田园的描写，纯粹是俄罗斯式的：

“青隐隐的远山，一片碧绿的秧田草地，点缀着菜花野花，一弯小溪潺潺流着；荫沉沉的树林背后，露出一两支梨花，花下有几间茅屋。风吹着白云，慢慢的一朵朵云影展开，终得似鱼鳞般的浪纹里映着五色锦似的，云呵，水呵，微微的笑着；远山颠隐隐的乌影闪着，

点点头似乎会意了。啁啾啾的小鸟，呢呢喃喃的燕子织梭似的飞来飞去。清澄澄的天，绿茫茫的地，荫沉沉的树阴，静悄悄的流水。好壮美的宇宙呀，好似一只琉璃盒子。”

在这种美丽的乡野风景中，人与大自然和谐相处，而现代都市文明中生活的人却是另一副样子，“那些工厂的人是吗？进了工厂出来，一个个乌嘴白眼的，满身是煤灰，——”。托尔斯泰一辈子都对乡村的俄罗斯充满了深厚的感情，到了晚年，托尔斯泰更是沉醉于乡村生活，通过乡村生活中的农民，托尔斯泰找到了上帝，瞿秋白也在乡村生活和下层人的生活中，找到了“心灵”的归宿。

在托尔斯泰的笔下，自然被赋予了一种象征的意味，它的纯静、透明、和谐，与人性的丑恶、社会的丑恶形成一种强烈的对比，托尔斯泰常用这种对比强化自己的批判主题。这种描写方法，在他晚期代表作《复活》中，表现得非常明显，小说开篇就是自然之美与文明人的恶浊的对照，而他美化宗法制度下的农民生活，一个值得人羡慕的因素，就是与宁静的大自然和谐完美的相处。

瞿秋白接受俄罗斯文学的影响并不是单一的某一个作家，而是在众多的俄罗斯作家中有所偏重，但我们在他的其它的作品中，看出屠格涅夫、甚至契可夫的影响，特别是对大自然风光的精确描述，而一些生活场景中的对话描写，又有屠格涅夫的影子。应该说，1920年，还处在草创时期的中国新文学除了鲁迅达到一个相当的高度以外，一些作家的创作还非常幼稚，这种幼稚具体地说就是文字的稚嫩、表现手法的单调，而瞿秋白的一些描写手法的老到，显然与俄罗斯文学的滋养分不开，在这里，我们摘录一段散文《错误》中的景物描写，可以看出瞿秋白是怎样把俄罗斯式的景物描写引入到中国新文学的描写语言中来：“菊花的清香，映着满地锁锁碎碎的影子，横斜着半明不灭的星河，照耀着干干净净的月亮。花梨下坐着三个人，地上纵横着不大不小的影子，时时微动，偶偶的低语，微微的叹息，和着秋虫啾啾唧唧，草尖上也沾着露珠儿，亮晶晶的，一些些拂着他们的衣裳，暗沉沉的树阴里飕飕的响，地上参差的树影密密私语。”这副画面是九月夜景，菊花、月影、秋虫等构成了整个画面的背景，而且静中有动，非常和谐。在五四时期的散文中瞿秋白的这种寄情自然的表演手法的运用，是非常突出的。应该说，他的成就与他在高等俄文专科学校的深入细致的研读俄罗斯文学有关。

四

通过瞿秋白早期创作与俄罗斯文学的关系的审视和思考，我们可以得出几点有价值的结论：

一、在中国新文学寻找发展范型的重要阶段，瞿秋白像所有步入文坛的写作者一样，对中国新文学可能呈现的形态进行了认真地探讨，对各种体裁类型进行了多方面的尝试，在他不多的文学创作中，小说、诗歌、政论等方面均留下了实验性、探索性的作品，这些准备时期的创作，大部分与他翻译介绍接受俄罗斯文学是同步的，因此他的叙事的语言和意境创造，以及由此表现出来的审美观念都与俄罗斯文学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在思想内容层面和艺术层面建构了既与俄罗斯文学关系紧密又具有实验性质的文本。透过他对俄罗斯文学的借鉴，可以看出中国新文学是怎样在俄罗斯文学的滋养下，形成自己独到的精神品格。

二、瞿秋白对俄罗斯文学的接受的过程表明，只有那些与接受者知识素养相契合的西方异质文学，才能被加以注意，在瞿秋白翻译的几个俄罗斯作家中，真正对他产生影响的，只有果戈理和托尔斯泰，而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托尔斯泰，而托尔斯泰在五四时期，是一个非常令人关注的作家，因此瞿秋白对他的接受，又是外在社会心理的投射的结果。

三、瞿秋白早期的翻译接受所表现出来的精神人格的矛盾状态也在其创作中有所表现，他在作品中表现了游离现实、寄情自然的价值取向。这实际上是那种具有浓郁的“托尔斯泰

主义”的文学作品和果戈理晚年具有神秘主义倾向的作品在他的创作中的投影，这表明在风云激荡的时代，在已经进入社会舆论中心时他并没有成为一位完全忘我的战士。用他自己的话说，他不是一个“政治动物”。而正是个性化的审美趣味表明瞿秋白与传统的深切联系，也表现了作为五四新文学的开启者的走向现代过程的曲折历程。

http://www.chl.hbnu.edu.cn/xszl/detail.asp?n_id=344